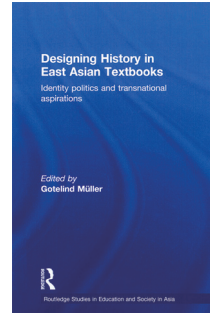


書評

東亞歷史教科書中的歷史設計 認同政治與跨國界渴望

Designing History in East Asian Textbook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ransnational Aspirations

by Gotelind Müller
Routledge, 2011, 290 pp.
ISBN 978-0-415-60252-5



陳昫萱

壹、前言

教科書從來都不是價值中立的，也從來都不是無意識形態與無政治的，正好相反的是，無論我們習慣或不習慣、看到或看不到、承認或不承認，教科書作為一種族群競相發聲的場域，可以將某種特定知識普及化、正當化與合法化的白手套，呈現出一種權力與政治傾軋後的圖像，而教科書內容的變遷，則體現了這些權力傾軋的軌跡，尤其是在歷史理解、詮釋與教學範疇中，特別變化多端又模稜難解的政治與文化認同議題，是如何與教科書的內容彼此刻劃，經常竭盡歷史、文化以及教科書研究者的心力，而《東亞歷史教科書中的歷史設計——認同政治與跨國界渴望》（*Designing History in East Asian Textbook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ransnational Aspirations*）一書，一方面為東亞歷史、認同與教科書彼此間難分難解的糾葛，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圖像；同時也為相關議題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研究典範，為教科書研究指出了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

貳、內容摘要

本書源於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卓越群組計畫——全球脈絡下的亞洲與歐洲」(Cluster of Excellence on 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的研究成果,由該系教授 Gotelind Müller 主編,這些論文主要由參與該群組的學者所撰,也都曾發表於該群組的研討會;書中共有 12 篇論文,聚焦在教育如何被用來服務政治社會化的目的,或更準確說來:教育如何被用來型塑國族認同,論文又依各子題編排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份包括了 5 篇論文,關注於造成對於東亞、認同與教育等議題的爭論,及一連串關於國族與東亞發展史的歷史偶然性。第一篇論文是中國學者孫歌(Ge Sun)所撰〈編寫東亞歷史教科書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compiling textbooks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孫歌從知識論的觀點出發,廣泛地討論了傳統漢學、日本與韓學研究學者所共同面臨的一個挑戰——對於東亞意義的理解,因為這三個東亞國家的不同歷史經驗,讓這些國家的學者對於何謂東亞難以達成一個共識性的理解,無法形成共同的「東亞」認同。第二篇為主編所撰〈中國學校所教授的他者歷史——國家、文化不對等與遞嬗的歐洲意象〉(Teaching 'the others' history' in Chinese schools: the state, cultural asymmetries and shifting images of Europe (from 1900 to today)), Müller 以 20 世紀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歐洲印象的轉變與其可能對未來學生就東亞區域發展史的理解影響為例,探討中國教科書自我/他者概念以及文化不對等關係呈現方式的變遷。第三篇為德國學者 Klaus Vollmer 所撰〈當代日本公民與倫理教科書中對於自我、西方以及亞洲他者的建構〉(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Western and Asian 'other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civics and ethics textbooks),該篇論文將研究焦點延伸到公民科,分析日本公民教科書中「自我」(self) / 「完全他者(歐美)」(total other (Europe/US)) / 「相對他者(東亞)」(relative other (East Asia)) 的呈現方式與變遷,以及其與歷史教科書一樣具有關鍵的型塑力。而第四篇為英國學者 Edward

Vickers 所撰〈學會熱愛祖國——香港回歸後的國族教育〉(Learning to love the motherland: 'National Education' in post-retrocession Hong Kong)，則採取一種廣泛的角度來分析香港九七回歸後的認同以及認同改變的問題，指出統治當局利用愛國教育、課程改變及教科書審查與出版的方式，型塑香港人具備一種更為政治化與國家取向的認同。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篇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張隆志 (Lung-Chih Chang) 研究員所撰〈述說一個島國的歷史——臺灣當代歷史教科書的學術與政治〉(Telling histories of an island nation: the academics and politics of history textbooks in contemporary Taiwan)，作者以《認識臺灣》教科書與臺灣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發展為例，分析了戰後臺灣本土化運動對於臺灣歷史教育改革、學術典範移轉以及認同政治問題所造成的影響，指出了臺灣認同問題與政治及社會變遷之間的緊密連結。

本書第二部分探討中日歷史教科書設計實務面的議題 (History writing in school textbooks: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這部分有 3 篇論文，首先是中國當代史與歷史課程研究學者李帆 (Fan Li) 所撰〈當代中國的新課程改革與歷史教科書編寫〉(New curriculum reform and history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探討了中國教科書生產與審查的實務性問題，分析中國最近開始實驗以主題探討式的歷史教學方式取代紀年史編寫歷史教科書所導致的挑戰。另外，中日關係區域史及慰安婦研究學者蘇智良 (Zhi-Liang Su) 所撰〈中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他者——聚焦於中日關係〉(The 'others' in 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a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則分析上海地區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實驗計畫，日本在這些教科書中如何被塑造成「他者」，並提出參考解決之道，其中之一為參考歐洲模式，共構中日韓共同的歷史教科書。最後，繼續補充前 2 篇中國教科書的研究，日本歷史教科書編寫學者 Miyake Akimasa 所撰〈在當代日本教科書中重寫歷史〉(Rewriting history in a textbook in contemporary Japan)，則分析了日本教科書的生產和審查

程序與這些程序對於教科書編寫和出版者的挑戰，作者以其自身所編寫的一本教科書為例，探究在設計日本當代史教科書過程中整合「他者」不同聲音的努力。

第三部分則有 4 篇論文，雖說是關注於國族立場所引發的不同歷史認知與衝突，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之道（Self-assertion, revisionism and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conflicts and perspectives）。第一篇是德國的日本研究學者 Steffi Richter〈東京審判的歷史觀以及其於當代日本／東亞的改寫〉（The ‘Tokyo Trial view of history’ and its revis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East Asia），分析日本右翼團體的教科書及影片等媒介，呈現東京審判及罪犯方式，直指其再現如何重新界定日本／西方（美國）與亞洲他者。而韓國學者 Jae-Jeong Chung 的〈韓國與日本的歷史衝突與對話——聚焦於日本歷史教科書〉（Historical conflict and dialogue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a focus on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s），繼續分析了日本右翼團體就日韓教科書爭端中的修正主義，指出這些未顧及韓方歷史情緒的修正主義所造成的爭議，以及近來日韓雙方共同的教科書計畫，試圖克服過去那些不同國族歷史認知的衝突。緊接著為鑽研德國現代史之日本學者 Kawate Keiichi 所撰〈從日本角度看德國與波蘭的歷史和解——一位日本歷史學家的思考與其發展〉（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Poland as seen from a Japanese perspective: the thoughts of a Japanese historian and their development），經由對照探討德國與波蘭共同書寫歷史教科書計畫以試圖解決衝突的努力，指出東亞案例的差異與共同處，建議以超越雙元對立的國族主義觀點，但同時不犧牲主觀認知的方式來共構教科書。第四篇則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科書諮詢專家，也是德國著名教科書研究所（The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前所長 Falk Pingel 在〈調停教科書的衝突〉（Mediating textbook conflicts）一文中，以更廣泛的觀點比較探討引發這些教科書爭議的問題（例如：政治意識形態與各種學術品質及教育標準等因素），

並且分析東亞幾個試圖處理這些爭端的教科書共寫計畫，以期找出真正可以關照各國多邊關係的建設性方式，來理解東亞二十世紀以來的幾個關鍵歷史時刻。最後，主編 Müller 進行總結時，再次細述這些論文的獨特性，以及指出對未來研究的一個方向：如何為教科書中的他者與自我再現的議題提出一個適切的思考架構，以避免忽略歷史教科書中的主觀意識，並同時避免激化對立，以促進教科書編寫理論與實務的進步。

參、回應與省思

對非亞洲讀者而言，本書提供了一個理解東亞諸國在歷史教科書的衝突觀點以及引起這些問題的脈絡背景；而對於臺灣的讀者而言，這些討論除了協助臺灣了解自己在這些東亞爭端中的所在位置，理解幾個鄰國面對與處理教科書發展理論和實務的一些問題。

而對於教學者、教科書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來說，本書則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反思性架構，協助吾人思考歷史多面向性與教科書論述角度彼此的關係，反思教科書設計應如何讓學生理解到：一段歷史事實上有許多面向，同一面向也涵蓋許多層次，自己所認識或經驗的面向僅是其中之一，即便只是單一面向，也有多重層次需要細細抽絲剝繭，難以從唯一角度來看待歷史，更無法說誰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不同的生命經驗與經歷構成了不同面向的歷史。因而，教科書設計不僅應讓不同的歷史經驗有陳述的空間，也應試圖開啓不同觀點對話的可能。而認同的問題也難以僅從既定僵化的國族認同來談，而必須更細緻地思考不同族群因為諸多偶然因素，對於一段共同歷史有不同經驗與理解，認同也因為時間與人生經驗而持續發展轉變。

這樣的認知，讓我們可以思考到：教科書或許可以被用來當作政治社會化媒介，但或許也可以被用來當作一個開放討論的空間，讓島民以生命共同體作為開放討論未來的共同期許以及形塑共同認同？因為以

生命共同體的方式來理解歷史，似乎才有可能解構並超越一種被標籤化的認同，因為歷史並不以某一種特定的歷史觀點而已，也包括進一步了解社會結構與權力流動等形塑這些歷史觀點與經驗的過程，而理解這些社會結構與權力流動，得以同時理解到族群差異是如何可能被當作一個標籤來塑造認同，歷史教育又是如何被標籤所形構且利用；而教科書又是如何可能被用來繼續標籤化族群？經由這樣的理解，吾人才有可能運用教育與教科書促成衝突的理解與和解？而非藉由教科書繼續激化對立。

此外，本書在研究方法層面間接引發日後可繼續研究的方向。由於本書關注的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因此方法上著重於歷史文件、教科書的文本內容分析，以期架構出歷史脈絡、政治力與教科書的三者彼此的交錯影響，較少關注學生實際上對於類此內容的實際看法，以及這些內容是否對學生認同發生了實質的影響。雖然對臺灣來說，考試引導教學的現況的確對於教科書作為正確答案的基礎仍有高度影響力，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現代學子接觸新聞媒體與網路社會媒體的機會遠甚於教科書，因此教科書影響學生到何種程度，學子究竟是否照單全收教科書內容，或正因其是教科書而發展出相反的看法，必須進一步藉由研究觀察老師在課堂上如何運用教科書的內容，並觀察學生實際上自身認同的看法方能得知。英國文化研究學者 Hall（1980）在探討編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溝通模式時，指出訊息的製造（production）、傳播（circulation）、使用（use）與再製（reproduction）並非如傳統研究者所認為的線性過程，而是彼此獨立運作的過程；亦即，雖然媒體製作者可以將特定意識形態編碼於媒體中，然而訊息接收者的解碼並未必會被動地直接接受媒體製造者所欲灌輸的訊息；反之，訊息接收者是主動地，其解碼方式與其所處經濟地位、文化背景與個人經驗高度相關。而伯明翰學派研究電視觀眾的社會學家（Morley, 1992; Morley & Brunson, 1999）也依據其針對電視觀眾所作的研究，證明觀眾解碼的方式有：主

流霸權 (Dominant/Hegemonic)、妥協 (Negotiated)、反對 (Oppositional) 等三種不同的態度。準此，即便教科書被當作政治社會化的媒介，那麼學生作為媒介所欲溝通的對象，也有相當可能因其不同背景而有不同認知與詮釋，因此難以直接斷定教科書是否可稱為一種政治社會化的有效媒介。當然，這個觀點並非是要減損分析教科書研究作為一種政治媒介的問題，而是指出本書間接指出日後值得發展研究的方向：繼續針對學生對於教科書的理解與認識，來觀察教科書是否對於型塑學生的認同有其影響，強化教科書作為政治社會化工具的研究。

在提供教科書研究許多反思可能的同時，本書也牽引出一些潛藏的權力結構議題。例如本書 12 篇論文中，有 2 篇單純探討中國教科書議題，4 篇探討日本教科書，2 篇探討韓國教科書，1 篇探討了中日韓對於東亞的不同詮釋，還有 1 篇探討中國教科書的中日關係，最後探討香港和臺灣與總結各 1 篇。因此，在論述比重上強調中國、日本與韓國為重，似乎東亞的定義僅由這三個國家來定義，而香港、臺灣的觀點則為點綴性的各 1 篇，這樣的安排容易形成東亞即是中國、日本與韓國，或甚至如首篇作者孫歌所言：因為區域政治的關係，該篇論文所探討的東亞範圍並不涵蓋北韓與臺灣，而一般對於東亞的認知主要包括中國、日本與南韓 (p.9)；然而，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臺灣曾為日本殖民地，這兩地的案例不僅對照出西方與東方殖民經驗的差異，國族主義的弔詭更可以反映出這些政治歷史對於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與教科書的層層影響。

從此而言，張隆志對於臺灣的討論，則點出了臺灣教科書與臺灣認同之間的動態性而隱晦的擺盪與掙扎，其實與過去日本殖民、國民政府統治與當代中國的影響習習相關，凸顯出這種多重歷史偶然性對於國族認同與教科書編寫的深刻影響力，以及本議題的交錯連動程度，可惜本書僅有此篇討論，而主編在介紹該篇時，也只是簡單帶過，難以充分將臺灣面臨此議題所獨有的複雜性以及對於國際教科書研究的獨特貢獻

性凸顯出來。簡言之，本書雖然希望探討國族主義與歷史交織影響下的教科書，以及其中自我／他者的問題，其本身作為知識領域的一環，似乎並未跳脫既有以國族為基礎的論述架構，而此也開啓了進一步的討論空間。對於臺灣而言，國際上既有框架限制並不表示臺灣案例就沒有討論的空間，反而更能反映出臺灣學者積極參與類此對話與討論的重要性，因為我國學者參與類此討論，不僅可以深入以教科書內容的轉變反映出以國族發展定義認同的弔詭，認同形成的持續動態性，對於國際教科書中的歷史與認同議題必然有所貢獻。

最後，成就本書難能可貴之處，是在其跨國對話與合作背後，少被教育學者關注，卻至為關鍵的翻譯議題，或是更廣泛來說：語言議題。誠如編者於致謝詞中簡單卻特別感謝譯者協助翻譯各種資料與論文（p. xiii），語言與翻譯對於類此跨國討論，了解彼此的經驗與詮釋，以尋求共識有其關鍵重要性，雖然許多教科書研究與歷史研究學者精通第二外語，然而為了讓跨國對話更多元而充分，避免「運用外語的能力」成為另外一種壟斷發言的無形權力，讓翻譯作為媒介造就更多元、多向的溝通與討論，才有可能讓歷史詮釋、認同議題與衝突解決更能建設性地對話。

參考文獻

-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M. G. Durham & D. M.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ks* (revised ed.) (pp. 163-173). Oxford, UK: Blackwell.
-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Morley, D., & Brunson, C. (1999). *The nationwide television studies*. London, UK: Routledge.